

近代“西体中用”观探析

——郑观应的“体”“用”思想

杜 菲

(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3)

摘 要: 对于近代的一种新兴的文化思潮——“西体中用”观, 郑观应做了较为完整的概括, 把对西学的认识和运用向前迈进了一大步。郑观应认为, “西体中用”观的落脚点在西体, 即政治上的议院、经济上的商业为本、文化上的教育为本。郑观应的这一思想不仅是对“中体西用”观的继承和发展, 还与“西学中原”观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 因此, 他长期处于矛盾状态之中。总体而言, 郑观应的这一思想还未能突破“中体西用”的框架。

关键词: 郑观应; “西体中用”观; “中体西用”观; “西学中原”观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近一个半世纪以来, 学术界关于中国文化的讨论, 主要是围绕着传统与现代、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关系的争论所展开的。而发端于洋务运动初期的中西文化体用论问题, 则一直是这两种争论的焦点。学术界对于中西文化体用论中的“中体西用”观的研究已达到了一定的广度和深度, 而对于在“中体西用”观的基础上形成的“西体中用”观的研究, 却远不够深刻。本文拟通过概述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郑观应的“西体中用”思想, 对“西体中用”观作一探析, 以就教于方家。

一

形成于 19 世纪 80 年代的“西体中用”观, 是清末的一种新兴的文化思潮。洋务运动在 19 世纪 60 年代初起步后, 经历了 20 多年的发展, 较之早期有了相当大的变化。而此时向西方学习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洋务派知识分子群体, 逐渐表现出两个新的特点, 一是很多人通过出使、游历等方式远涉重洋, 直接感受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 他们对西学的认识较之以往更加深刻; 二是更加注重学以致用, 不断充实自己的西学观,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新的主张和要求。而“两者的有机结合, 形成了‘西体中用’观”。^{[1](P122)}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郑观应, 便是这些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

郑观应(1842~1922), 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雍伯乡。本名官应, 又名观应, 字正翔, 中年以

后别号罗浮侍鹤山人。^{[2](P1530)}是近代著名的爱国者, 也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2](P125)}郑观应少年时便“究心泰西政治、实业之学”, ^{[2](P1532)}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 中年后又曾“前往西贡、暹罗、金边各处”, ^{[2](P1539)}在海外进行游历考察。在结合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郑观应对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 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进而形成了自己的新见解, 成为了中国近代“西体中用”观的典型代表人物。

1884 年, 郑观应在《南游日记》中指出: “余平日历查西人立国之本, 体用兼备。育才于书院, 论政于议院, 群民一体, 上下一心, 此其体; 练兵、制器械、铁路、电线等事, 此其用。中国遗其体, 效其用, 所以事多捍格, 难臻富强。”^{[4](P946)}这是郑观应第一次较为系统地全面地提出了他的“西体中用”思想, 也是郑观应“西体中用”思想形成的标志。而这一观点被前两广总督张树声在遗折中原封不动地引述, 并进一步明确概括为“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 也就是后来为人们所知的“西体中用”观。

二

郑观应的“西体中用”观落脚点在西体, 即政治上以兴议院为本、经济上以商业为本、文化上以教育为本。1880 年, 郑观应撰写了《论议政》, 对“泰西各国”之“议

收稿日期: 2008-02-14

政院”作了详尽的介绍,称:“其都城设有上、下议院。上院以国之宗室勋戚及各大员当之,以其近于君也。下院以绅耆士商、才优望重者充之,以其迎于民也。凡有国事,先令下院议定,详达之上院。上院议定,奏闻国主。若两院意见符合,则国主决其从违。倘彼此参差,则或令停止不议,或覆议而后定。”^{[5](P103)}从中可以看出,他对议院的了解,不仅远远超过了林则徐、魏源的水平,也超出了同时代的冯桂芬等人。1888年,他又在《盛世危言》中说“盖闻立国之本在乎得众;得众之要在乎见情。故夫子谓:人情者圣人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此其说谁能行之,其惟泰西之议院。议院者,公议政事之院也。集众思,广众益,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法诚良、意诚美矣。无议院,则君民之间势多隔阂,志必乖违。”^{[6](P311)}在这里,他明确提出,议院是西方国家的立国之本。在对西方的议院有了详尽的了解后,他对此表达了强烈的向往,说:“中国户口不下四万万,果能设立议院,联络众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何至坐视彼族越九万里而群逞披猖?”^{[6](P313)}“中国而终自安卑弱,不欲富国强兵为天下之望国也则亦已耳,苟欲安内攘外,君国子民持公法以永保太平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6](P314)}

与政治上以兴议院为本相联系的,是经济上以商业为本。考虑到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不断加剧,郑观应强烈要求清政府发展民族工商业,与外国侵略者进行商战,说:“彼之谋我,噬膏血匪噬皮毛,攻资财不攻兵阵,方且以聘盟为阴谋,借和约为兵刃。迨至精华销竭,已成枯腊,则举之如发蒙耳。故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培克敝国无形。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纵令猛将如云,舟师林立,而彼族谈笑而来,鼓舞而去,称心餍欲,孰得而谁何之哉?吾故得以一言断之曰:‘习兵战不如习商战’。”^{[6](P586)}而清政府沿袭农本商末的封建传统,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严重阻碍了我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因此,他要求清政府解除封建束缚,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说:“苟能一变隆古之习,视商如士,由国家明定科条:凡有能讲求商务独出心裁者,准其领照自做,官为保护,他人不褫挠夺。有能与外国人斗智角力,期杜外来之货者,官为晓谕,或轻其税以助之。若能代国家购办军械、制造等物,实系克己奉公者,礼以待之,信以任之。其他如出口之货有作伪者,准商举发,立予查究。进口之货外国人可得半税者,一律施行,勿为丛驱爵。商籍准就近应试,殷商准接见官长。”^{[7](P593-594)}而在洋务企业创办和发展中,官督商办逐渐表现出的种种弊端,尤其是对民间资本的诸多限制,更促使郑观应提出废除官督,任由商办的主张,把经济

改革的目光放在“商本”上,说:“如朝廷有体恤商贾,任天下之人自造轮船——亦未始非富民之道也。”^{[8](P53)}不仅如此,他还明确指出官督商办是“不能护商反而病商”,清政府是有“困商之虐政”,而无“护商之良法”^{[9](P609)}。

要进行政治经济改革,首要任务是培养实行改革的人才,说:“横览环球各邦,其国运之隆替,莫不系乎人材,而人材之盛衰,莫不关乎教化。其教养有道者,勃然以兴;教养失道者,忽然以亡。”^{[10](P480)}鉴于此,郑观应又把兴办近代学校,培养进步人才提上了日程。与此前所创办的同文馆不同,他提倡兴办的学校,要求引进西方资产阶级教育制度,他说:“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国势所由强,故泰西之强强于学,非强于人也。”^{[11](P276)}他还着重论述了西方的考试制度,说:“泰西取士之法,设有数科,虽王子国戚亦与考试。如欲当水师将帅者,无不兼习天球、地舆、测量诸学;编入行伍,以资练习。文案则自理,枪炮则自然;即至贱至粗之事,皆不惮辛勤而毕试之。……至矿师、医士,无不明于格物,通于化学。讼师亦须深明律例,考有文凭方准行世。”^{[12](P203)}他把西学与中学进行比较,指责中国落后的教育制度钳制学术,扼杀人才,阻碍了人们对西学的了解和应用,说:“学校者人才之本,格致者学问之本。中国士子于诗文小楷之外,罕所讲求。一旦得中科甲,遂目空一切,其实不知国家利弊如何,格致工夫如何,徒有虚骄之气;贱视工商,鄙视武夫,傲视西人。纵见西人教养善法心悦诚服,亦不肯悉心仿办,必改头换面,以为因地制宜。其实吝惜小费,或经办从中渔利,以致所授不全,所学不精也。”^{[11](P481)}

在郑观应眼中,西学精华在其本,即西方的政治、经济和教育制度。舍本逐末是此前国人学习西方成效不彰的根源,因而,学习西方的关键是学西方的政治、经济和教育制度。

三

郑观应的“西体中用”观是对较早形成的“中体西用”观的继承与发展。“中体西用”观较好地解决了引进西学初期,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问题,它体现了人们主观对客观的反映程度。而随着西学东渐的逐步深入,人们逐步体会到西学的精华所在,开始思考“中体”与“西体”孰优孰劣的问题。郑观应既直接参与洋务运动,又以一个近代思想家的睿智,鸟瞰洋务进程,尤其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民族矛盾的再次激化和边疆危机的发生,清政府在处理内政、外交上的诸多问题上,频频出现捉襟见肘的窘态,更促使他重新审视“中体西用”观的误区,并逐步把“中体西用”观发展到新的高

度,以寻求新的突破。“西体中用”在形式上虽只要求变“西体”为“中用”,但其目的却是要将议院制引进中国。议院制若为“中用”,势必会威胁“中体”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中体”必然发生质的变化。然而,在寻求突破的同时,郑观应又试图有所保留,力求在“中体西用”框架的基础上实行“西体中用”,把“西体中用”融合到“中体西用”之中。按照他的思维模式,只要把“西体”变为“中用”,就可以既越过进一步引进西学的障碍,又保留“中体”的主导地位。但他不愿承认,“中体”与“西体”的矛盾在“中体西用”的框架中永远是无法调和的。如遵循他的思维模式走下去,最终的结果还是会回到“中体西用”的老路上来。

郑观应这种自相矛盾的思想观念的根源,在于“西学中源”观。1861年,冯桂芬曾把“西学中源”观概括为:“中华扶舆灵秀,磅礴而郁结,巢燧羲轩数神圣,前民利用所创造,诸夷晚出,何尝不窃我绪余。”^{[13](P146)}其后,郑观应对“西学中源”观也有诸多论述,并且,在当时的思想界形成一种“西学中源”思潮。“西学中源”观为洋务派反击顽固派提供了有力的武器,也给引进西学蒙上了一层神圣的色彩。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西学中源”的意义不在于学术价值,而更多的在于政治需要。但“西学中源”观是十分荒唐的,它不仅带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理论误区,构成向西方学习的障碍,又易被顽固派拿过去作为反对学习西方的武器。

1878年,马建忠率先批判“西学中源”观:“夫泰西政教,肇自希腊,而罗马踵之。”^{[14](P205)}到了80年代,钟天纬的《格致说》中充分论证了“西学”的源流,并详细介绍了亚里士多德、培根、达尔文等人的学术渊源和思想体系,从理论上否定了“西学中源”观。他们摈弃了“西学中源”观,而更多的人则陷入了两种理论交织的网络之中。郑观应1880年解释西方议会“颇与三代法度相符”,^{[5](P103)}1884年提出“西体中用”,承认“西学”体用兼备,但到了1894年却又津津乐道“今天下竞言洋学矣,其实彼之天算、地舆、数学、化学、重学、光学、汽学、机器、兵法诸学,无一非暗袭中法而成。”^{[12](P273)}可见,他既积极提倡“西体中用”思想,但有时又无法完全摒除“西学中源”观的影响。这种矛盾状态表明郑观应的思想体系正处于由封建知识分子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过渡阶段。他代表着新生的资产阶级,由于经济政治力量十分弱小,理论也不足,这必然常使他从封建传统思想范畴中寻找自己所需的武器。

郑观应的“西体中用”观的主要特点在于,它看到了西学是“自成体系,自有体用”的,他把练兵、制器、

开矿、经商等事视为“西用”,把育才于书院,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看作“西体”。他的这种思想的实际意义是把近代对西学的引入推进了一大步,强调当务之急是学西方的富强之学、富国之政、富民之道。然而,这种思想又被“中体西用”观的误区所制约,试图在保留“中体西用”的框架基础上引“西体”为“中用”,把“西体中用”融合到“中体西用”之中。郑观应否认了一个基本事实,“中体”与“西体”的矛盾的根源在于两种文化本质、乃至两种社会制度的差异,采用“西体”势必破坏“中体”,固守“中体”势必排除“西体”。

参考文献:

- [1]周辉湘.论洋务“西体中用”文化观[J].求索, 2001, (01): 122~125.
- [2]夏东元.郑观应集(下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1530, 1532, 1539.
- [3]谭锐.试论郑观应的中学、西学观[J].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3, (03): 125~128.
- [4]郑观应.南游日记[A].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946.
- [5]郑观应.易言·论议政[A].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103, 103.
- [6]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上[A].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311, 313, 314.
- [7]郑观应.盛世危言·商战上[A].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586, 593~594.
- [8]郑观应.救时揭要·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A].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53.
- [9]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二[A].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609.
- [10]郑观应.盛世危言·教养[A].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480.
- [11]郑观应.盛世危言·西学[A].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276, 481.
- [12]郑观应.易言·考试[A].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203, 273.
- [13]冯桂芬.制洋器议[A].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下[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 146.
- [14]马建忠.适可斋纪言纪行[M].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 2004: 205.

作者简介:杜菲(1978-),女,安徽淮南人,现为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06级近现代史专业研究生,师从欧阳跃峰教授,主要研究晚清史。